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 傅立群

回首我国近代御外史，不能不对郑观应这位晚清杰出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的一腔爱国赤忱油然而起敬。1842年，他生于紧邻澳门的广东香山县雍陌乡一个书香家庭。时值鸦片战争后民族危难之秋，他蒿目祖国久病积弱、国防不保的可悲时刻，憎恨海外列强虎噬狼吞、鱼肉中华的强盗行径，“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数十年奔走呼号，上下求索，留下了一部志在富国强兵以攘外、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一代救时名篇《盛世危言》。作者针对晚清社会国贫兵弱的种种陈弊，对比中外，纵横今古，提出了一整套补世救国的主张。其内容之广泛，眼光之开阔，观点之先进，卓然凌乎同时代他人之上，堪称中国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大纲。因此，该书于19世纪末中日甲午风云之际开始面世时，各界瞩目，几至洛阳纸贵。有识之士或称之为“包宇之利害，发千年之痼疾”的“绝世雄文”，或赞之是可使国人“悉革瞶聋之病”的“医国之灵枢金匱”。当然，这些评价未免过誉。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郑观应并没有、也不可能开出一套真正能使中国独立富强的“灵枢金匱”。不过，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维新志士和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曾得力于他的思想熏染，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把《盛世危言》做为酷爱的发蒙读物，其进步的历史作用，从中可见一斑。

“横看成岭侧成峰”。综观郑氏《盛世危言》全书，可以说既是一部系统的社会改良纲领，同时又是一套国防理论体系。郑观应认为，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攘外”，攘外则必须“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社会，如此方能实现振兴。也就是说，他所言的各种社会改良主张，都是紧扣着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如何强固国防、制胜外侮这个最紧迫的时代主题而立论、而展开的，爱国主义是贯串《盛世危言》全书的精神主线，国防思想是构成全书的基本内容之一。如今，我们的祖国早已换了人间，郑观应那个时代遍体疮痍的旧中国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但是，认真领略他所阐发的国防思想，不能不感到其中若干基本观点，至今依旧价值未泯，对我们当前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改革颇有补益。为此，本文愿以1895年刊刻的《盛世危言》14卷本为主要依据，就郑观应国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几个有关问题谈

点认识，就教于大家。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是晚清时期中华民族救危图存的时代要求产物；郑观应本人丰富的阅历，广博的中外知识，特别是以民族忧患为已任的爱国抱负和与时俱进、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则为这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缺的主观条件。

19世纪中叶，中外情势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世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完成，产业革命中喷若泉涌的新兴科技成果，自文艺复兴、宗教改良、启蒙运动等前后数百年思想解放运动以来而弘扬于全社会的科学与民主的观念，新航路开辟以来从海外殖民帝国掳聚的巨额财富，这一切结成一座巨大的风火轮，使近代欧美国家拔地腾飞，国势一跃而居世界之最。他们在资本扩张的动力驱使下，乘着蒸汽机大工业时代的炮舰跨洋过海，把侵略的黑爪伸到东方的大清帝国。而曾经雄踞宇内千年之久，向以“圣朝天国”自居的中国，由于过于发达的封建主义罗网的抑滞阻碍，近代以来成为世界进步大潮中的落伍者。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损，人口数亿之众的中华民族终于沦为他人俎上鱼肉。空前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惊醒了紫禁城内统治者“爱夏夷鄙”的陈梦，一批头脑相对开化的清王朝大官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接过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于1861年开始兴办起洋务运动，冀图借以寻得一条摆脱内外危机的出路。这场前后历时30余年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虽然也给腐朽的中国晚清社会带来了种种近代新风，但在“中体西用”的精神藩篱下，加之国内顽固派的掣肘和外国资本的压迫，终究未能挽长城于既倒。70—80年代，英、法、俄、德、美等老牌列强企图肢解中华国土的侵略活动更为猖獗；就连原本比中国落后的东瀛弹丸岛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一跃而强，开始染指我台湾和东北。及至90年代中期的甲午战争，偌大个中华帝国竟然惨败于日本手下，战争的失败敲响了洋务运动的丧钟，大批爱国志士们群情鼎沸，痛定思痛：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振兴国防，抵御外寇？一时之间，各种见解主张纷纷而生。郑观应的国防理论，就是对中华民族面临的这一历史课题所做的一种系统思考。

郑观应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来到世间，家里本想让他走科举仕途，但17岁那年考试小试不售，遂奉严命，赴沪学贾。来到上海，初随叔父见习经商，兼学英语，继入洋行谋生，自1860年起开始了20余载的买办生涯。处身“花月之光明十里，笙歌之声溢四时”的商都，郑观应眷怀祖国危亡，对声色犬马之类“萧然一无所好”。或曰与豪贤纵谈天下事，每每慷慨泣下，击碎唾壶。或寄情细素，广泛涉猎，悉心研究欧美政治、实业之学。为广拓视野，更好地借鉴西方富国强兵之术以为救世之用，他特意到一位传教士所办学馆夜修英文。当时，他寄希望于洋务运动，70年代末跟李鸿章和盛宣怀、郭嵩涛等洋务派风云人物建立了关系。至80年代初，正式投身这一运动，先是以洋行买办身分兼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总办，接着又于1882年结束在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营生，转入洋务派的骨干企业轮船招商局任职，操劳实业之余，郑观应将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感怀见识寄笔成篇，于1873年和1880年相继刊刻了两部早期著述《救世揭要》和《易言》。其中，后部著作已超出一股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界范，初步阐发了中国应取议院制度的新法、以改革政体的主张。但在国防问题上，当时尚未形成系统见解。

1883年冬，中法战争山雨欲来，以御侮救国为已任的郑观应主动请缨，踊跃置身国防斗

争第一线。翌年3月，被新任粤东防务大臣的清廷兵部尚书彭玉麟誉为“明干有为，熟谙洋务”的郑观应奉调赴广东军营后，立即圆满办成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把我方购自德国、但在香港被英国督府禁运的25门大炮提运至广东。接着，又被委派总理湘军14营营务处。6月，他身荷抗战派人士彭玉麟和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重托，赴南洋考察法方敌情。在西贡，详细调查了法军在越南的实力与布置，在泰国，游说摄政王“合纵抗暴”；在新加坡，书成《边防管见》等时事五策上致张之洞。整个考察期间，写下《南游日记》，对自己多年来寻求的富国强兵之道进行了系统反思，批评洋务派学西方“遗其体动其用”。回国后，10月以《防法条陈》10条上呈李鸿章，就提高军队战斗力、防备间谍、断敌供应等问题提出对策。随后，又投身于加强琼州防务和援助台湾军民抵法事宜。为援台，这位爱国志士曾决心投笔从戎，以身保国，主动请求率兵千名牵制法军。不幸，正当他经香港前赴察看地形时，被英方港督借故囚禁。半年的铁窗折磨，加上实业界同行中人的嫉妒攻讦，使郑观应一时贫病交迫，身心瘁然。1885年夏获释后，在故里和澳门过了五年多“杜门养病”的隐居生活。其间，他把救国壮怀倾注笔端，在《易言》基础上扩写成《盛世危言》。进入90年代后，民族存亡危机空前加剧，列强图谋彻底瓜分中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活动尤为紧锣密鼓。郑观应从隐居中走了出来，一方面接手操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局和汉阳铁厂等洋务派企业的经营与建设，一方面密切注视时局风云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动向，先后陈述了关于抗日的《管见十条》、《条陈中日战事》和《防台条陈》七款，提出战、守、备三策，反对乞和，并提出将招商局的4—6条新式快船留充军用。数年之间，他以救时救国的一腔激情，对已辑成的《盛世危言》进行了系统的增补修订，于1894年春将自己这部大半生心血之作首次付梓成书。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又及时总结战败的深层教训，对该书再次进行了大幅度的增改，14卷本《盛世危言》于当年逐告面世。至此，郑观应的国防思想连同他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张，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

从《盛世危言》全书看，郑观应的国防思想可以说属于一种“大国防”思想。他讲国防，决不单纯囿于强兵问题，而是把强兵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一体地考虑，强调依靠提高综合国力来巩固国防。因此，书中所阐发的国防思想，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其基本观点，举其荦荦大者，似应包括下述各点：

1、富与强相维系。这是郑氏整个国防思想的根本立足点。他首先认为，一个国家，“非富不能国强，非强不能保富”，只有“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卷三·商战下》）。也就是说，“富国”与“强兵”两者首先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但是，两者相比，他强调的是首先须切实富国。他指出，“四海困穷，民贫财尽，斯历代之所以衰乱也”，（《卷三·商务三》）“纵有坚甲利兵”；又怎能“驱赤身枵腹人之”去“当前锋冒白刃”呢？（《卷三·商战上》）无论是“练兵铸成，添船增垒，凡强兵之举，没有一样不是”耗费巨款的。如果“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出，民借难筹”，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地“言强兵”，那无异于硬搞“无米之炊”。（《卷三·商战下》）他对中外各国在强兵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做了总结对照，指出，自列强侵华以来，国人凡有血气者无不欲结发负戈，“求与彼决一战”。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军，讲

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从此中国就能国防强振、“水漂而陆奋”了。殊不知百十年来国家积贫，“膏血既竭”，已成“羸瘦病夫”，故洋人以兵侵华“举之如发蒙耳”。（《卷三·商战上》）。相反，海外列强事事处处必求利求富，以此为资本，所以能有坚船利炮的兵强之势。特别是日本，“事事以中国为前事，处处借西邻为先导”，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短短20年便国势大张。因此，郑观应认为，中国只要“一改旧法”，切实把求富的“无形之战”置于重点，充分发挥“地大物博人多财广”的有利条件，“国既富矣，兵奚不强？”（《卷三·商战上》）这里，郑观应的观点固然有“国富自然兵强”的偏颇一面，但他明确指出“富”与“强”不可分割，强兵须以富国为基础，这无疑是符合军事唯物论的观点的。

2、“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是郑观应国防理论中最著名的观点，同时也是他从自己的富强观必然引申出来的结论。他认为，中国自海禁大开的百多年来之所以日愈贫弱，最大的祸源莫过于“不知以商为战”，深受外国经济侵略。他指出，西方“各国以商富国”，“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国家的一应举措无不着眼于商战攫利，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是“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而中国视商为贱末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只知兵战不知商战，在中外通商中无数利权溢流洋人之手，“其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尤甚”。如仅鸦片和洋纱洋布两宗进口每年就合计耗银八千六百两，杂货进口每年耗银三千五百万两，其它货物的进口和因愚蠢的关税政策与货币制度而造成的损失更不计其数。而出口所得则连鸦片洋布两项进口所耗都抵不上，更不用说列强在华势力的直接经济掠夺了。其结果，“中国日蹙”，“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强兵从何谈起！他由此得出结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蔽国无形”；“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只有知胜商战，国家才能富，“国既富矣，兵奚不强？”因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决胜于商战”（《卷三·商战上、下》）。而中国要想在对侵华列强的商战中制胜，就必须全面改良社会。特别是要打破所谓崇本抑末、以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把促进和保护商务做为国之要政；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着力于振兴制造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因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有了技术先进的机器，才能制出物美价廉商品，在商战中居于优势；改革教育，广开学馆，更新教育内容，广泛倡兴“格致之学”，使举国“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提高国人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因为愚昧的民族是无法在商战中领先的，改良政治特别是吏治，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商务管理体系，使历来只知“病商”、扰商、剥削商贾的各级衙门变为“助商”、“护商”。

郑观应的这套商战思想，使他在我国近代国防理论领域独树一帜。他所说的注重商战，跟近代西欧那种重流通轻生产的重商主义并不相同。他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在“兵战”中屡屡败绩，现象上看是由于在坚船利炮等利器方面落后于人，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商战上的无力乏能，致使利权外溢，失去了强兵的物质基础。他认为，要强兵就得富国，而欲富国就必须强化商战，在反对外国经济侵略中操得胜算。显然，郑观应的这套见解已脱出了传统的军事国防思想，进入了注重综合国力建设的大国防思想境界。当然，他在阐述商战重于兵战的观点中，把商战的作用夸大得过了头。甚至主张将用来改善清军武器装备的必要军费开支移用于发展商务，这无疑是一种片面性。

3、“以兵卫商”。郑观应强调中国应效法欧美日本以商富国、注重商战，并非是说兵战不重要，武备可以不修。他从“能强而后可以保富”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以兵卫商”的

思想。也就是说，商战要以强足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屏护。为此，他很重视强兵之术，《盛世危言》14卷本中专门论述武备建设的部分就达23篇之多，所述内容包括练将、练兵、民团、水师、船政、海防、江防、炮台、火器、间谍等各个方面。用今天的话说，郑观应所谓“以兵卫商”，实际上是明确地提出了保卫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军队的一项首要职责。

4、“兵在精不在多”。军队是国防力量的主体，注重军队的质量建设是郑观应国防思想的又一基本点。他指出，鸦片战争外寇纷入以来清朝军队之所以每每败北，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兵制过滥，官兵素质过低，国家养一兵不能得一兵之用。他谈到，中日“启蒙以来，榆关内外防营林立，计淮军湘军铭军奉军甘军新毅军老毅军嵩武军定武军名目纷如”，举国拥有八旗绿营兵等正规部队60万，每年军费超过五千万两银，“兵力不可谓不厚”。然而，由于各级将帅官佐平日只知“优于自奉”，“酒色偷情”，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铃为实政，“未谙韬略，又无胆识”，临战又“贪财惜命”，“人各一心，营各一名，不相策应”；兵卒则“多老弱无赖之辈，鲜精强克敌之夫”，一旦猝临大战，很少不“目骇心惊，手足无措”，纷纷作“鸟兽散”，因此，中国养兵虽众，实则积弱不振，难与外国侵略军的强兵悍将相匹敌。针对这种积弊，郑观应鲜明地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实行精兵的方针。

那么，军队建设怎样才能达到“精兵”的要求呢？郑观应针对当时清军的状况，借鉴欧美经验，提出了一套原则，即“仿西法，设书院，练将才，明地理，识敌情，制利器，足食足兵，额无空设，饷无虚糜，无兵勇之分，尽成劲旅，法则善矣！”从《盛世危言》的有关篇章来看，郑观应开出的这套“善法”所涉内容甚广。如改变“中国重文轻武、稍一承平便视兵事为不祥”的传统，提高从军者的社会地位和年满养老待迁，以利吸引社会英才于戎旅；改募兵为选兵，入伍须经严格挑选，“亲邻具结方许入营，不使老弱病残滥竽充数，更不使哪些投身军旅只是为了“胜则大发洋财、平居亦可冒虚粮吞公费”的无赖之徒混杂戎行；革新军队人事制度，废除长期以往那种“不知其暮气已重”、唯“志于军务”者是用的论资循班旧习，改变那种将帅不习武艺、不读兵书，有勇无谋”，只要“一时侥幸成名”，就能“位尊爵崇”的开迁制度；广开兵械制造，发展各种利器；坚决革除军营中苛扣饷粮、勒索军服费用，摊派欠饷、刑赏过当”等四大弊端，使上下同心，等等。不过，他最为强调的是改革和加强军队教育训练，即所谓兵之所精，“贵乎实练”。

郑观应认为，“内安外攘莫先于兵，整旅行师莫重于练”。然而，中国军队仿西方练兵虽已多年，但只知学“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不懂得这仅仅是“兵法绪以余而已”，故兵练多年而未致精强。因此，必须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大加改造。他提出，在训练的指导思想，要坚决破除那种只求鼓号响亮、操练齐整、“观美徒存、难收实效”的形式主义；在训练内容上，应“先练其心（爱国精神），次练其身（军事技能），再练其气（作战胆略）”；在训练的方式和标准上，要放眼世界，广泛借鉴，“互相师法；舍短集长”；在训练的重点上，要实行“练兵先练将”，把提高将帅素质做为建设精兵的战略重点。郑观应主张，提高将帅素质，关键是要办好武备学堂，使军官教育正规化、近代化。他认为，强兵包括人和器两大要素，“器者末也，人者本也”，而学校正是“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应从兵官中精选“身体精壮、能通书史而有胆略者”，送武备学堂进行正规训练，学习数学、军事筑城学、古今战史、军事地理、兵法、兵律和外语，考试合格者始准留馆深造。结业时择其优者赴步、马、炮、工各兵种军营各“阅历数月”，然后才能授以军职。高级指挥职务则更须由经长期训练筛选并久历战阵者担任。总之，通过学校正规系统的教育训

练,使军官队伍高度知识化、专业化,使其知识结构和才干素质达到“武员可以兼文,文员不可以兼武”的水平。各级将领兵官的素质精干了,整个军队才有可能建设成攻摧守坚的精兵。

三

郑观应的上述思想,是晚清时代条件的产物,其观点主张的局限与偏颇之处固然不乏,但对我们今天仍多有启发、借鉴作用。

1. 传统的国防观应当改造。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与西方的商业航海民族不同,中国长期处于封闭性的农业自然经济之下,在这种经济方式基础上积淀形成了一种单纯守土型的狭隘国防观。而守土又主要是指御守江淮河汉流域农业发达区域,防止游牧部族问鼎中原。而今天,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需求和对外开放,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国家的经济利益及其它合法权益的空间分布范围大为扩大,这就要求我们的国防建设不仅要“以兵卫土”,还必须“以兵卫商”,为国家在国防经济交往中的各项正当权益,如陆海边陲地区的资源主权、海上交通权、域外投资、贸易和科学考察权等等,提供可靠的安全盾牌。为此,有必要很好地阐发弘扬郑观应的“以兵卫商”思想,使人们脱出“单纯守土”的传统国防观旧臼,使我们的国防观念和军队建设适应我国当今安全生存与安全发展利益需求的发展变化。

2. 正确处理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的基础在于经济,现代战争条件下尤其如此。郑观应关于富国才能强兵的思想符合国防发展领域的这一客观规律。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解决了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还比较落后这一主要矛盾,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其它各项事业才能获得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相对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必须自觉地坚持在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行动的指导原则。然而,国富本身并不等于兵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必需的国防安全保证。因此,我们又必须坚持关于富国与强兵相关系的辩证统一思想,实现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两者不可偏废其一。中外历史上国富而兵弱、结果沦为他人鱼肉的教训并不鲜见,我们务必避免犯这类错误。

3. 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应抓好“人才”这个根本。现代世界各国国防发展的经验教训证明,郑观应在近百年前提出的“器末人本”的观点,反映了国防建设领域的一大通律。对于我军今天来说,武器装备的落后固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弱项所在,我们固然要大力提高我军装备的技术水平。不过,更为迫切的是培养和举拔大量现代化的军事人才。为此,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使之不致变为一句有名无实的口号。